

袁志刚 主编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China (Shanghai) Pilot Free Trade Zone

新战略研究

随着WTO红利的逐渐消退，以及中国经济疲软和对外贸易的持续下行，中国也迫切需要推进新的国际贸易框架协议的达成，以重新确立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地位，并以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参与并分享国际自由贸易的游戏规则的制定。在这样的人群眼下，中国没有选择，必须“再入世”。全球化最尊的目标是要把所有阻碍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的阻力铲除。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最根本的结果是提高经济的效益，尽管这其中会存在一些问题，但不管怎么说，全球的资源将由此得到优化配置——跨国公司的资本资源得到了优化配置，就一定带来全球其他要素的优化配置，如劳动力和土地的优化配置，所以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最根本是促进全球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经济效



率的提高，中国加入新的国际贸易协定，必然会极大地推进中国制度的改革和制度红利的释放，而现在的中国最大的问题则是投资主体和投融资体制以及要素市场的扭曲。只有借助外力，对外开放，并以开放促进改革。上海自贸试验区诞生的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的开放，为了进一步的改革，为了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发展将面临许许多多的问题，既有涉及对全球趋势判断、自贸区定位、政府转型、贸易升级、金融开放和创新等战略方面的思考，也有大量涉及具体政策如何推进、监管如何更新、法制如何建设、产业如何布局；资本如何走向全

袁志刚 主编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China (Shanghai) Pilot Free Trade Zone

新战略研究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战略研究/袁志刚
主编. —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ISBN 978-7-5432-2322-6

I. ①中… II. ①袁… III. ①自由贸易区-经济发展
战略-研究-上海市 IV. ①F752.8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66257 号

责任编辑 葛 智
美术编辑 路 静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战略研究
袁志刚 主编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格致出版社
www.ewen.cc www.hibooks.cn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23层)



格致出版

编辑部热线 021-63914988

市场部热线 021-63914081

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6
插 页 2
字 数 246,000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32-2322-6/F·692
定 价 38.00 元

前 言

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弥漫着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美欧已是明日黄花,甚至认为世界的未来将要由新兴经济体领导。后危机时代,所有发达国家在开始阶段均十分紧张,而这种情绪直接导致了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但是随着美国对个人、企业、金融机构和政府资产负债表的修复,美国复苏基本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经济的好转背后,是欧美国家的自信心的增强。而伴随着经济基本面好转的,是美国再次吹响全球新自由贸易秩序的号角,并希望借此走出危机,迎接新一轮的增长。作为美国构建全球新自由贸易秩序的核心之一,新的国际贸易框架协议——无论是 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还是中美双边投资协定 BIT,实际上都是在为全球自由贸易制定“游戏规则”,为人类编写全球自由贸易大宪章。新的贸易框架是要经济资源在全球流动和配置以更自由的方式进行,而且是以有利于人类将来的持续性方式增长。而这些国际贸易框架中的关键内容包括全球价值链基础上的自由贸易、投资协定、服务贸易开放等等。对中国而言并无特别负面的信息。随着 WTO 红利的逐渐消退,以及中国经济疲软和对外贸易的持续下行,中国也迫切需要推进新的国际贸易框架协议的达成,以重新确立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地位,并以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参与并分享国际自由贸易的游戏规则的制定。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没有选择,必须“再入世”。

全球化最终的目标是要把所有阻碍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的阻力铲除。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最根本的结果是提高经济的效益。尽管这其中会存在一些问题,但不管怎么说,全球的资源将由此得到优化配置——跨国公司的资本资源得到了优化配置,就一定带来全球其他要素的优化配置,如劳动力和土地的优化配置,所

以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最根本是促进全球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效率的提高。

在自由贸易的秩序下，全球 GDP 的饼肯定是越做越大。当然不同的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国家的要素、禀赋差异非常大，肯定有些国家获利更多，有些国家获利更少，因此这些就需要谈判。中国和美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要素禀赋，但一个基本的判断前提是，中国目前在全球产业链、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位置和美国相比差异性非常大，美国要素和中国要素基本面是互补的，当然竞争和冲突也肯定存在，但是这其中的大势是合作和进入自由贸易区利大于弊，对美国来讲中国进入是利大于弊，对中国来讲积极加入美国的 TPP 也是利大于弊，这是一个基本的概念。因此，中国的整个态度应该是积极开放的加入态度。

全球化之风劲吹的同时，中国也正走到了各种问题堆积的关口。

在金融业高度垄断和金融市场价格扭曲之下，金融风险在上升；人口老龄化正在加剧，金融配置效率低下。中国经济目前面临最大的问题是改革，释放制度红利。而改革的发端首先应是政府职能的转变。从过去十年来看，政府介入经济行为过多，经济领域中权力无处不在。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的投资主体和投资机制渐有“开倒车”之意，现有的投资主体正在转为为地方政府的建设投资和为国有企业的过剩产能投资。大量的民营企业，却面临种种融资之难。除了投资主体问题，国内对投资的审批制度也存在问题。此外，以金融、银行等间接融资为主的大量资金大多流入地方融资平台和国有企业，而直接融资的比重很低。甚至是直接融资的市场——A 股市场也被做坏了，成为大量国有企业上市圈钱之地等等，真正的结构性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因此，投资机制问题亟待解决。

市场体系的完善、微观经济主体的强壮是中国在新一轮对外开放中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那么只有通过开放来倒逼改革，从过去十年加入 WTO 的历程来看，当时很多人觉得开放后会出现问题的领域，都没有出现大的风险，相反都在问题解决之后，大大提升了竞争力；而长期受到保护的行业反而越来越落后。

中国加入新的国际贸易协定，必然会极大地推进中国制度的改革和制度红利的释放，而现在的中国最大的问题则是投资主体和投融资体制以及要素市场的扭

曲。在 TPP 中,最要害的内容是准入前国民待遇、国有企业的竞争中立、负面清单管理、高端服务业更高层次的开放。短期看这些对中国的确有很大的冲击。但是从实质性来看,中国改革最难的就是打破既得利益,这其中国企就是既得利益方,地方政府就是既得利益方,金融业、高端服务业就是既得利益方。如何突破这些现有利益群体呢?只有借助外力,对外开放,并以开放促进改革。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应运而生。上海自贸试验区诞生的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的开放,为了进一步的改革,为了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因此,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发展将面临许许多多的问题,既有涉及对全球趋势判断、自贸区定位、政府转型、贸易升级、金融开放和创新等战略方面的思考,也有大量涉及具体政策如何推进、监管如何更新、法制如何建设、产业如何布局、资本如何走向全球等战术问题的研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均在全国占有优势,世界经济、金融学和国际贸易更是其中的强项。学院的许多教师又参加了国家商务部和上海市合作的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课题,对全球化及最新趋势、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的谈判及其实践、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演变及中国在其中的地位、中国金融改革、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人民币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全球价值链中的金融服务体系的重要性及中国的应对、自贸试验区的“营改增”税收实践、自贸试验区中的离岸再保险中心建设等领域都有长期的研究积累。上海自贸试验区实践的使命是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发展的使命,也是中国经济学家通过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取得经济学理论突破的使命。我们期待这本书的出版,能引起中国经济理论界对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关注以及对全球化和中国经济改革与开放的讨论。

袁志刚

2013年11月

目 录

| | | |
|------|------------------------------|-----|
| 第一章 | 经济全球化新趋势与中国应对 | 001 |
| 第二章 | 上海自贸试验区发展战略思考 | 027 |
| 第三章 | 借力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打造中国外贸升级版 | 048 |
| 第四章 | 全球价值链分工与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的逻辑 | 074 |
| 第五章 | 上海自贸试验区“价值链”金融服务体系的形成 | 104 |
| 第六章 | 上海自贸试验区的资本市场开放与创新 | 123 |
| 第七章 | 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与中国利率市场化 | 144 |
| 第八章 | 上海自贸试验区大宗商品人民币计价权研究 | 170 |
| 第九章 | 上海自贸试验区率先试点金融业“营改增”的必要性和方案研究 | 182 |
| 第十章 | 上海自贸试验区与离岸再保险中心建设 | 195 |
| 第十一章 | 金融诚信体系建设对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的重要性 | 209 |
| 第十二章 | 自由贸易区洗钱与反洗钱:国际经验与中国对策 | 226 |

第一章

经济全球化新趋势与中国应对

袁志刚 余宇新

经济全球化的话题自莱维(Levi)在1985年提出就被广为关注,也为经济学家们所热烈讨论。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世界经济展望》(1997年)所指出的,经济全球化是指二战后全球物资、劳务和资本构成的国际市场的融合。20世纪70年代后,全球通信系统的建立标志着人类社会开始进入了相互联系、共同生存的全球化时代,而在之前,尽管存在着大量的跨越国界的经济活动,但是人类经济社会的相互依存与共担风险的特征并不明显。随后的信息技术发展,互联网普及使得经济全球化更成为一种清晰的经济常态特征,并对经济主体的决策过程产生重要影响。因此,确切地说,经济全球化只是近几十年才出现的新现象、新事物。

众所周知,这一轮经济全球化的盛宴随着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而有所放慢,危机爆发对全球经济都造成了巨大冲击和影响,也令人们开始真实感受经济全球化对各国、各企业以及个人生活的影响,如何理解经济全球化的未来趋势,成为大家都关注的课题。因此,本章以这轮经济全球化的特征、影响以及动力机制的分析为基础,来探讨未来经济全球化的可能趋势,并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现阶段特点提出中国相应的对外开放战略。

一、经济全球化动力机制与发展特征

(一) 经济全球化动力机制与载体

这一轮经济全球化主要是从 20 世纪的 80 年代开始逐步兴起的,是在资本逐利的推动下,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产业跨国大转移为基础展开的。

在这一全球化进程中,以美、欧、日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为跨国公司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布局提供资本和技术,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或发展中国家为跨国公司全球产业价值链提供劳动力、土地等要素,由此形成了全球化生产过程中的层次明晰的要素供需循环体系,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成为产品需求方、产业资本供给方以及金融资本需求方,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成为劳动力供给方、产品供给方、产业资本需求方以及金融资本供给方。这带来的结果是新兴经济体因为要素供给能力的上升超过其产品需求,而成为贸易顺差国和外汇储备盈余国,在本国缺乏有效率的资本市场的情况下,这些资本又通过国际金融市场回流到美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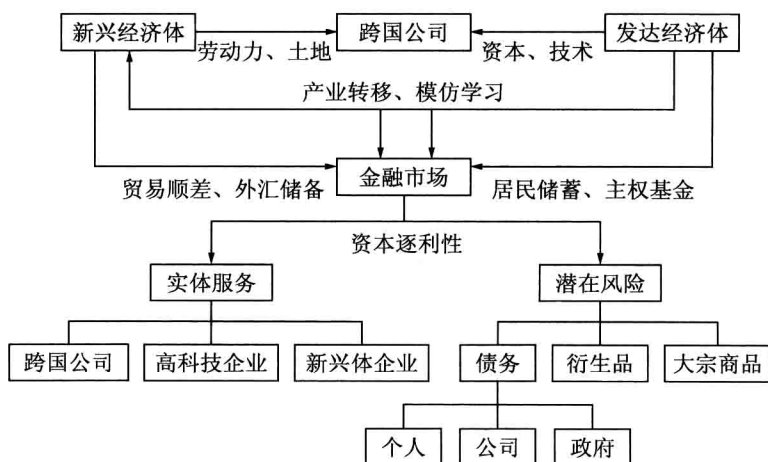


图 1.1 经济全球化运行机制

这些回流的资本在以华尔街为主导的金融市场上,在资本逐利本性的推动下,在实体经济方面,流向跨国公司、高科技企业或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在虚拟经济方面,则流向于各类债券、金融衍生品和大宗商品市场,带来个人、公司和政府债务杠杆率的上升,并因此为次贷危机的发生埋下了隐患,也使得危机后世界各国不得不进行去杠杆化的经济再平衡过程。

这一轮的经济全球化是由生产过程全球化来决定的,而不是由产品交换来主导的,产业资本全球化是根本推动力量,而跨国公司是产业资本实现全球化产业链构建的主要载体,也自然地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20世纪80年代,在人口老龄化和市场竞争的压力下,以及技术进步带来的交易成本的下降推动下,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通过FDI带来了产业跨国大转移,推动了出口型经济体如亚洲“四小龙”和中国内地等新兴经济体加入到全球化进程中,促使经济全球化不断得到深化。世界贸易占GDP比重也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20%不到,增长到2011年的32%左右,由此推动了贸易、资本和劳动要素等要素通过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方式实现了全球优化配置。

(二) 经济全球化发展特征

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特征是经济领域的贸易交流由于全球化的深化而愈加的广泛,在产品流动方面表现为贸易全球化,在要素流动方面表现为资本全球化以及资本流动而带来的劳动要素配置的全球化。通过世界银行数据库的数据^①,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经济全球化特征的发展过程与特征。

1. 产品流动全球化

产品流动全球化即贸易全球化,是这一轮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最显而易见的现象之一。二战后,运输技术和通信技术的进步带来各国间贸易成本大幅下降,推动了贸易全球化的进程。如弗兰科尔(Frankel, 2000)所指出的在1920—1990年间美国货物的海运成本就下降了70%,空运成本1990年只有1930年的16%,在同一时期纽约到伦敦的3分钟通话费在1990年下降到只有1930年的

^① 如果没有特殊说明数据结果都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或基于世界银行数据库所进行的运行结果。

1.36%(都以1990年美元计)。贸易门槛在技术进步的作用下已经大幅下降,成为推动世界贸易规模占全球GDP比重上升的重要因素。

包括日本、亚洲“四小龙”与中国内地在内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加入世界市场是贸易全球化得以大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它们的参与过程是由跨国公司主导的产业转移来推动的,所以期间表现的贸易全球化特征都是基于产业全球化发展过程的。产业大转移带来的生产过程全球化,产业价值链布局全球化即生产工序过程也开始日益全球化。通过对世界FDI增长率与世界出口增长率的分析,也支持世界FDI流动对贸易流动的驱动作用。

就目前贸易结构来说,货物贸易仍旧居于主导地位,在1980年货物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重是85.5%,之后所占比重持续下滑,最低在1992年低至74.7%,在2011年所占比重为79.6%。在2007年的次贷危机后,货物贸易有一个较大幅度的下降,但是随后迅速地回升,基本上回到了危机前所占比重,这表明金融危机引起人们需求下降导致货物贸易下降的影响,仅仅是暂时性的,危机对于世界贸易体系来说并未带来持续的破坏力。而货物贸易仍旧处于世界贸易的主导地位,这说明当前的经济全球化中,产品生产全球化特征仍是居于主要位置,全球产业价值链的网络联系仍旧是经济全球化的最重要的特征。

2. 要素流动全球化

经济要素流动的全球化也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发展特征之一,包括资本流动的全球化与劳动要素流动的全球化。

资本全球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产业资本全球化;二是金融资本全球化。

(1) 产业资本全球化。

就产业资本全球化来说,主要是指全球FDI的兴起,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逐渐成为经济全球化中的主导力量。如前所述,FDI增长趋势决定了贸易的扩张进程。这一轮的经济全球化是由生产过程全球化所决定的,而不是由产品交换来主导的。生产过程的全球化其实就是生产工序过程开始全球化,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因为现代化工业生产采取了标准化零部件方式,而产品生产的工序过程是可分解的,且具体的不同生产工序过程对于要素禀赋结构需求存在着差异,这为生产工序层面的全球化提供了可能空间;二是如前面所说的,现代技术的发展以及国际交易制度与体系的日益完善,使得跨国间交易成本大幅下降,令跨国公

司采取分解产品生产过程,从产品工序层面利用各国要素禀赋优势变得更为经济可行,也就使生产全球化可以从产品零部件的层面来挖掘各国间要素比较优势,促使发达国家的外包业务成为一种趋势。这也就让我们理解,为什么在服务贸易发展迅速的情况下,货物贸易仍旧会居于主导地位的原因;同时也就能理解为什么跨国公司会以建立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形式来参与到世界市场的竞争中来。因人口老龄化和市场竞争的加剧,使发达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也成为产业资本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

因此,跨越国界的 FDI 和产业转移,不仅成为推动产品贸易的发展的重要力量,而且是促进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流动的直接力量,使各国经济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形成相互联系与相互依托的关系,世界经济也因此越来越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特征日益显著,而这些都是跨国公司的产业经营活动主导下完成的。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组织各类产品生产与流通,引导或支配着全球经济要素的流动方向,成为此轮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和主要承载主体。

(2) 金融资本全球化。

金融资本全球化也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表现为金融市场国际化、金融交易国际化、金融机构国际化和金融监管国际化。

金融资本全球化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因素共同推动的,一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相继实施了金融自由化措施,放松金融管制、取消利率上限、引入创新金融工具、放宽市场准入和营业限制,为金融资本的全球性流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可能性,也为金融资本创新活动提供了制度基础;二是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全球范围的资金流动和交易清算在瞬间即可完成,这种技术上的保障使得人类得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金融资产配置。但正如斯图尔茨(Stulz, 2005)所指出,由于双代理问题的存在,即使在国际间投资壁垒大幅下降和技术准备成熟条件下,金融资本的全球化仍旧相当有限。就美国而言,它拥有世界上最发达同时也最国际化的金融市场,但美国的投资者持有的国外金融资产占其 GDP 的比重 1% 不到,美国投资者持有的外国证券占其证券组合大约只有 22%, 78% 仍是其国内证券。

这表明,金融资本并未能成为这一轮全球化进程深化的主体和主导推动力。必须承认由于产业资本具有经济发展过程的支配力,也自然具有对此次经济全球

化的支配力。这是因为经济发展的基础是产业资本投资的结果,产业资本的投资决定了经济发展的方向,金融资本的发展需要依托于产业资本的发展,依赖于产业资本的财富创造能力,金融资本本身并不能创造财富,只是节约了社会交易成本。

金融资本的全球化过程必须依托于产业资本的全球化进程,因此一旦金融资本全球化发展脱离产业资本的全球化运动方向时,就容易出现金融危机,比如2007年的次贷危机。危机发生于金融资本逆产业资本的全球化过程而出现的金融脱媒,即产业资本从发达国家流入发展中国家,而金融资本却从发展中国家或其他资本盈余国家流入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这样的对流循环关系使得两类资本的回报率持续出现较大的差异,由此引起这一脆弱的对流循环链被打破,从而出现危机。因此,对于危机解决的对策之一就是如何来协调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回报率差异的问题,根本的解决途径就是实现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配置比例合理化,其实质是金融资本的运动必须反映产业资本的运动,虚拟经济必须为实体经济服务。

(3) 劳动要素流动和配置的全球化。

在这一轮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劳动力要素的全球化规模是史无前例的,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在1980年大约有9370万的劳动力进行了跨国界的迁移,随后的30年间持续增长,至2010年达到了21331万人。麦克米伦和罗德里克(McMillan and Rodrik, 2011)指出这一轮的劳动要素流动的全球化主要是从生产效率低的低收入国家劳动力转移到高生产率的发达国家,提高了劳动力要素在全球的配置效率,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但是劳动力要素跨国迁移所占全球劳动力总量的比例在最近20年来都没有一个明显的趋势性上升,其间还存在着较大幅度的下降,就目前来看也不过6.6%。不过劳动力要素的全球再配置将不仅可以提升低收入的迁出国的劳动力福利,也提高了接受国即发达国家的福利水平(Freeman, 2006)。就从此轮的全球化特征来看,劳动要素的全球化流动远不是主导力量,产业资本全球化流动所带来的包括劳动在内的生产要素全球再配置是基本的主导力量。这一新趋势尤其是随着中国这样拥有13亿人口、7.8亿劳动力的国家加入全球化得到更好的体现,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国内成功转移了2.7亿劳动力,其中相当部分是与跨

国公司的产业资本相结合的。

(三) 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1. 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地位决定各国经济结构变迁特征

经济全球化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的深刻的影响,不同国家由于其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国际分工所存在的差异,而出现了不同的经济结构变迁特征。

从图 1.2 可以看出,就世界整体来看,经济全球化使分工更为深化,世界整体的经济结构趋于“软化”,具体表现为第三产业的发展快于第二产业的发展。就不同国家来看,以美、日、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经济结构“软化”趋势明显,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经济结构呈现“硬化”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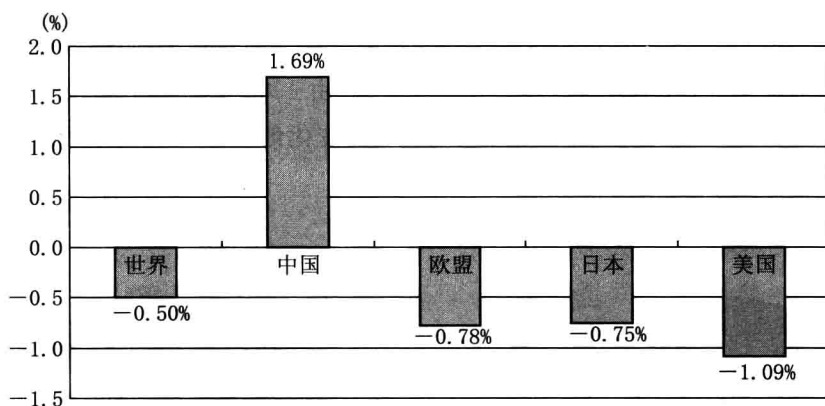


图 1.2 不同国家和地区工业增加值与经济总量增速差异

这是因为跨国公司根据不同国家要素禀赋比较优势来进行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布局,发达国家更专业从事产业价值链的“微笑曲线”两端的发展,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承接了产业链的制造业部分,以发挥其劳动力数量优势。这一国际分工的结果,一方面使得发达国家自身的产业结构发生变化,工业所占比重趋于下降,第三产业得以兴起,推动了发达经济体的持续增长和结构优化,如帕尔维兹(Parviz, 2004)的研究就表明美国 FDI 的增长是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发达国家因发挥其资本、技术优势而分享全球化的红利,造就了长达 30

年的相对平稳增长;另一方面因为承接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制造业端,也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得到一个有效的加速度提升,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实力得到了加强和提高,使得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农业化国家基本上完成了初步的工业化过程。

在这过程中,中国通过劳动要素、土地要素等经济要素与跨国公司资本与技术的结合,发挥了自身要素的比较优势,使经济要素配置效率得到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也因此得到提升,也因此分享到了全球化红利对经济结构优化所带来的好处。

2. 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当然,由于全球化红利分配的非均衡特点,使得各国在全球化过程中出现了发展不平衡的结果,具体来看就是新兴经济体相对实力上升,而发达经济体相对实力下降:

就以 1980 年和 2008 年各国占世界 GDP 的比重变化来看(参见图 1.3),原有的一些发达国家,不论是美国、日本、德国还是法国,其占世界 GDP 的比重都出现了明显下降;而韩国、中国、印度和巴西这些新兴国家占世界 GDP 的比重都是有一个显著的上升。很明显,中国上升幅度最大,由 1980 年的占比 1.72% 上升至 7.38%, 上升了 5.66%, 如果从经济总量地位的变化角度看,中国几乎可以说是这一轮全球化进程深化的最大赢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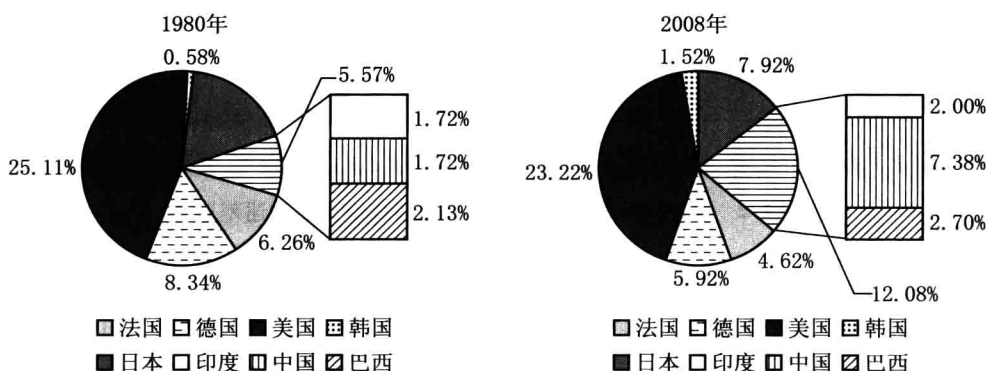


图 1.3 各国占世界 GDP 比重

不论是作为主动推动者的发达经济体来说,还是作为被动参与其中的新兴经济体来说,都分享到了全球化红利对本国经济发展的好处。但主导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发达经济体相对实力会有所下降,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相对实力

会有所上升,原因何在?

我们认为主要的原因在于全球化红利分享上存在的差异。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其跨国公司拥有高端生产要素如高素质的人力资本、技术优势和管理优势使其能控制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布局和利润分配,因此而获得较大的静态全球化要素收益分配红利。而对于像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来说,参与全球化分工之前,经济体内部存在着严重的要素价格扭曲,市场机制也极端不完善,通过参与全球分工,使得国内经济要素相对价格得以较大程度的改善,由此激励了要素的有效积累,在市场导向下经济整体配置资源的有效性也随之提高,提升了劳动生产效率。所以对于这些后进国家参与全球化,获得的全球化红利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于参与以效率为导向的跨国公司的全球产业价值链,使本国要素资源配置错配减少,优化了经济结构,使经济整体效率得到提升,并因此获得相应的国际分工的静态收益即静态全球化要素收益分配红利;另一方面是在参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分工过程中,国内扭曲的要素相对价格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市场机制使要素积累效率得到提升,从而增强了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并因此获得了全球化红利中的长期动态增长红利。

全球化动态增长红利的获取使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即使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仍旧由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所控制的情形下,在全球经济中所占份额仍可以随时间推移而有明显的提升,经济实力有了较大幅度的上升。当然,发达经济体参与全球化的要素也由此获得了最主要的静态全球化要素收益分配红利。这表明经济全球化道路,是一个共赢的发展道路。

二、危机后经济全球化发展新趋势

(一) 全球经济进入再平衡时期

2007年爆发的次贷危机,引发了世界经济大动荡,表明经过30多年的经济全球化过程,经济体之间的发展不平衡矛盾已难以维系。全球经济需要一个再平衡

机制,以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全球化进程。

在市场机制下资本决定了要素的收入分配方式,具体来说,就是资本要素决定劳动要素的收入,在产业资本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使得产业资本的去向决定了哪里的劳动要素可以得到更有效率的开发利用,也就决定了哪里的需求大小,由此决定了产业资本流动的非均衡性必然带来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在经济发展要素收益率层面,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收益率会因此出现失衡;另一方面是在经济发展主体层面,各国需求也因此出现失衡,导致全球需求处于非均衡状态。

因此,全球经济再平衡调整需要在两个层面实现:一个是经济发展要素层面,这要求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在收益率上达成新的平衡才能继续促进经济进一步发展;另一个是经济发展主体层面,主要是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实现再平衡。所以本章从两个视角研究再平衡问题,即:一个是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发展需要再平衡的视角;一个是全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需求需要再平衡的视角。

1. 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发展再平衡的视角

就如前面所述,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持续的差异性回报率是此次危机爆发的一个经济发展根源,而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持续的差异性回报率是由目前的收入分配制度导致的全球需求不平衡所引起的。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产业资本的外流一方面提高了产品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另一方面也使得本国不能适应全球化分工的劳动要素逐渐退出劳动市场,导致国内需求能力相对下降。就新兴经济体国家来说,资本、技术和管理等要素是垄断要素,享受垄断价格,而劳动要素是竞争性价格,是低价,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收入分配是非均衡的。结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象是,全球总需求吸收不了全球总供给。为了应对这种全球总供给与总需求失衡情况,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通过金融资本全球化的方式造成金融泡沫,通过财富效应来吸收过多的全球总供给。就短期而言,通过建立在资产泡沫基础上的家庭、企业和政府债务杠杆率的上升可以实现供给与需求的暂时平衡,但随着金融资本收益率逐渐地超过产业资本投资回报率,因此形成具有系统性风险的金融泡沫,最后只能以危机的方式重新调整社会资产的配置方式,以实现资产配置的再平衡和总供需的再平衡。这种调整的基础性工作就是各类经济主体